

# 绳绳文脉之书院精神

孙振宁

## 文明脉络

书院作为一个社会组织结构,起源于唐代,兴盛于宋明。扶沟的大程书院就是北宋时期程颢在担任扶沟知县时所建。历史上著名的岳麓书院、白鹿洞书院、应天府书院、嵩阳书院四大书院之所以闻名于世,不在于其建制规模,是因大儒讲学弘道而为后人敬重。

为什么这些大儒被后人如此敬重,他们所弘扬何道呢?程颢、程颐与周敦颐、邵雍、张载,并称北宋五子。程子倡导的性理之学及主德性修养,是为后世书院治学方式之奠基。张载提出的“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,为往圣继绝学,为万世开太平”,成为后世诸多书院治学之精神。这些儒儒的精神之所以能长存于世,在于其秉承了中华文明之脉。

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之道,以中华民族的发展特征为主,她属于整个人类社会文明。中华文明不啻为人类世界文明的组成部分,她与各种人类文明相互影响,融会贯通。中华文明“天人合一”之思想使其成为最悠久、最具有生命力的人类文明。“天人合一”体现了人类文明的产生发展脉络。为什么这么说呢?我们从“文明”开始探究。

据《尚书》所述,尧舜之时,中华民族已具有较为成熟的礼制及国家运行管理机制。尧帝德高,在位时社会运行和顺,为礼制成形奠定基础,尧帝被后世称为文祖。舜帝聪明睿智,通感物理人情,以此建立社会运行秩序,使万物各有其性、并行而不相害,为礼制雏形。孔子祖述尧舜,概因二圣所建之文为中华文明成形之始。

舜帝制礼启示我们,文以理为基,文是理的呈现,文与理一体,不可分割而论,什么样的理生发什么样的文,悖理则有不善之文。《论语》中子贡对文给出了准确定义,棘子成曰:“君子质而已矣,何以文为?”子贡曰:“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!驷不及舌。文犹质也,质犹文也,虎豹之■犹犬羊之■。”天命所赋予的性是万事万物之内质,万事万物的呈现状态即是其文。

尧舜从天理中探索人类社会运行之理而形成的人文。这种对天道的探索,由理成文并非起于尧舜,而是对人类祖先文明的继承。人类开始用火,据其特征被称作燧氏部落,建立巢穴被称作有巢氏部落,种植农作物被称作神农氏等等,这些都是人类对事物的认知和转化,是为人文。

道理之文是社会结构建立的指导方针和理论基础,伏羲氏如此,神农氏亦是遵自然之道而建,黄帝统一中原,农耕文化得以广泛传播,为中华文明飞跃性发展奠定基础,才有尧舜之道盛德至善局面。禹帝治水感通天物情

而创建五行,有庖氏威侮五行,背弃夏之道,启讨其罪。五行中有物相生相克之理,与天地四时大序相应的万物生息交替的五行之序。河图、洛书以五行为基础,以数成象,以方位成象,通过五行属性知其物性,反之,又能以像知数,通过五行之序辨其吉凶祸福。商先祖上甲微假中于河,商人以河龟卜筮,心诚于天,通于像,辨以五行,故知其吉凶祸福。殷高宗讨鬼方,多以河龟卜筮。高宗讨伐鬼方作誓责鬼方不敬图书,说明鬼方为野蛮无礼之族,非行中华文明之道也。

一阴一阳之谓道。文王得卜筮之诚,识阴阳之道,将物性人情及其发展变化与阴阳定数结合,现其卦,观其化,而作《易经》。

文王、周公之德奠定周王朝之基,且持续影响社会体系的建立。周王朝除了周公制定完备的礼制,还有一个重要的治国方针,即诗教。诗三百,是圣贤在事物上真诚心性的体现,承载了礼与心性的信息密码。子曰:“志之所至,诗亦至焉。诗之所至,礼亦至焉。礼之所至,乐亦至焉。”

文是理的呈现,由文而格物理,若学文只知其字面意义,心性未能通其理,不能有心之体悟或化为德行,非真知也。文之彰若失其根本,是文理相离,失其道也。《中庸》:“诗曰,‘衣锦尚纲’,恶其文之著也。故君子之道,暗然而日章;小人之道,的然而日亡。君子之道,淡而不厌,简而文,温而理,知远之近,知风之自,知微之显,可与入德矣。”君子做到简而文,温而理,是文理相通也,如此可格物致知,察人之所不知,而能知远之近,知风之自,知微之显矣。

宇宙怎么产生的不得而知,中国古代人将产生混元世界的命名为道,道生一;一生二,混元生阴阳;二生三,阴阳成体而成物。物因阴阳定数不同而被古人定义为金木水火土五行。

成像显于世是明也,用另一种方式表述即理形成文是明也。明非止于成像,眼睛失去接收相关信息功能的盲人难以看到光等成像,看不到光的盲人可以通过触摸、声音等接收外界信息而知成像,心中仍是明。因此明又是心感通物及理的过程,即古人所说格物致知。

圣人人性洁净,既知成像之物,又感通其理,圣贤所超乎人者,心正意诚也。圣贤从所感之事理,知其运行之道,制定万物并行而不相害的规则秩序,而形成文,指引人们向至善之道运行发展。

## 书院精神

当前,文献记载书院出现在唐朝。唐代书院既有官办,也有民办。相对于民间个人讲学,书院更显得有建制性。《资治

通鉴》:“上遣中使征李泌于衡山,既至,复赐金紫,为之作书院于蓬莱殿侧。”李泌不愿出任,唐代宗为了保持其民间身份而为其建书院,说明书院有别于国子监等官方教学机构。唐德宗少时游于该书院从李泌学文。说明官办的书院性质并非藏书场所,而是修行的道场。

宋代建立的书院是有建制规模的书院,书院有维持运转的学田,有管理人员,有督学,有讲师,还有讲学制度和院训。朱子所作院训,横渠先生所作《东铭》《西铭》等都代表了书院核心精神和治学理念。

宋代书院秉承孔子治学之道,以经学载道传承中华文脉,延续孔子、子夏、文中子、皇甫规等圣贤讲授经学与培育育人并重的教学方式。相对于官方的功用教学,民间书院治学较为纯、粹、精。

程子、朱熹等大儒治学精研义理,重视心性养成,使心通于义理,将义理验证于心性,深得孔孟为己之学之道。为己而学,则能立天地心,复天命之性,然后由本及末,知事之始终先后,从完善自我至于至善,而后齐家治国平天下。

书院秉此善道,方为有水之源,有根之木。为善,仁之方也,为善之道即修己安人,修己以安百姓。故志士仁人已欲立而立人,担当社会责任办书院,兴士子之教,传中华文脉。

书院几经兴亡,而能不断延续复兴,其精神存也。这种精神灌输给中华儿女的血脉之中,非某个历史事件可以割断、磨灭。清朝时期,书院精神逐渐丧失,书院沦为功用的模具,然仍有所生发。光绪十七年,康有为向陈千秋、梁启超之请,在广州长兴里万木草堂开始讲学。讲学内容主要是“中国数千年来学术源流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,取万国公法比例推断之”“大发求仁之义,而讲中外之故,救中国之法”,推动了戊戌变法运动。

## 文明脉动

书院精神的沦丧与社会环境影响有关,然书院兴衰与否最终取决于一个社会的士子精神是否沦丧。士子精神的起伏源自文理之辨。子曰:“质胜文则野,文胜质则史,野则难于经世致用,史则拘泥于功利,失其生命力。”孔子弟子,颜渊、仲弓、闵子骞重于德行修养,子夏重视实务,再求、宰我重功利。非圣贤,难以把握文与理合适的度。

子夏重视文学,易生出功利之学。曾子批评西河讲学有畔迹、酒从孔子所学,然子夏之文未明显脱节于理。有人问程子:“游、夏称文学,何也?”程子曰:“游、夏亦何尝秉笔学为词章也?且如,‘观乎天文以察时变,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’,此岂词章之文也?”

诸子百家时期,功利之学风大起,

诸侯利欲之心使社会长期动荡不安。秦始皇废道学,隋文帝废学校,皆自功利之心也。后世以八股文科考取仕,亦是功利大行,士子又何来自由之思想、独立之精神呢?又怎能格物致知,与时俱进呢?

功利之大行,皆因人心不知止也。子曰:“苟志于仁,无恶矣。”人没有志向,则不识其道,识仁道,不能安于仁道,亦不能止于至善也。人学文通理,为明道而行也,故学必思其用。若志于为己而学,完善自己,则可外学而内化。若心志于功利,则被外物外用所牵,失去自我,偏失正道。

有人认为科举的功用之学会影响修身,程子认为:“或谓科举事业,夺人之心,是不然。且一月之中,十日为举业,余日足可为学。然人不志此,必志于彼。故科举之事,不患妨功,惟患夺志。”为己而学,科举亦可作为心性之实修;志于功利,修身也成为功用。朱子门生也是学圣贤之道,然受科举功利之心影响,其心渐渐由君子之道坠入小人之道而不自知,诸学子在鹅湖之会上闻听陆九渊讲君子小人之辨而痛哭流涕。

## 书院担当

古人如此,今天我们仍面临同样的问题。古人办书院多由乡绅或宗族提供学田,今人办书院弘扬传统文化,需要自行解决学田问题。若以书院营生牟利,有失书院之道。心存善道,若因学田事务而乱其心志,丢失根本,亦将迷失仁道。即使有心为善,若眼里只盯着事情成功与否,则不能明心见性,不能修己安人。若只盯着事之功用而不为做事的人考虑,则不能知人之性,更不能知物之性,如此怎能功成结善果呢?若为做事而使人不安,则失人,失人则失土,失其位,失其领域,终坠入功利之道而败其事。

若畏功利如虎,心亦不正也。子曰:“敏则有功。”功,成事也,乃为善之道。心性正则事必有功,反过来从事务之工上可验证心性。丢掉事理谈心性则陷入虚谈清议。晚清时期,一些志士仁人主张向西方学习,而大学士倭仁认为:“尚礼义不尚权谋,根本之图在人心,不在技艺,今求一艺之末,奉夷人为师,所成不过技术之士,古往今来未闻技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。”足见迂腐之学误国误民也。然今有人主张复古却不知当代人权意义,修身而排斥当代科学文明,心岂在理上?又如何遵循天道承接文脉呢?

书院所教为己之学,重在成己成人,时刻不丢己之心,不丢书院之精神,任何外事功用为成己,完善自己,如此则可安于仁道,而后再谈兴士子之教,传承中华之文脉也。②8



# 自行车还不能退休哩

王天瑞

在大庭广众之下,如果你要平静地说“我家有一辆自行车”,也许人们还不知道你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。如果你稍有不快地说“我家有一辆自行车”,也许人们会认为你“哭穷”哩。如果你稍有高兴地说“我家有一辆自行车”,也许人们会认为你说梦话哩,或认为你精神不正常哩。现在,黄村人都在讲摩托车、电动车、小轿车,很少有人再讲自行车,也很少有人再骑自行车了。如果谁再讲自行车、谁再骑自行车,似乎谁就被时代甩落了十万八千里!

自行车,这种两个轮子的小型车,人骑上去,以脚踏蹬子为动力,带动车轮转动,再载着人和物前进,用来代步,既轻便又快捷,很受人们的喜爱和欢迎。不过,世界上发明和使用自行车的时间还很短,也仅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吧。过去,群众公认的我国自行车三大名牌,有飞鸽、永久、凤凰。天津自行车厂,1950年7月生产“飞鸽”牌自行车。上海自行车厂,新中国成立后开始生产“永久”牌自行车。上海自行车三厂,1959年1月开始生产“凤凰”牌自行车。在过去的很长时间内,拥有一辆自行车是人们很难实现的梦想。

黄村的第一辆自行车,是1963年5月的一天“飞”进村,是长春空军某部当军官,是全村人崇拜的偶像。芑兰被选为大队妇女队长后,曾给丈夫写信说,她每天忙得脚不沾地,累得腿痛腰酸,还是有跑不完的路、干不完的话、做不完的工作。丈夫理解爱人,立马买了辆“飞鸽”寄回来。他虽不能帮助爱人做工作,却可帮助爱人少跑路。

那时候的一辆自行车,现在在的一辆奥迪还稀罕。黄村里,很多人没有见过自行车,更没有骑过自行车,都想借来练练。芑兰人缘好、心和善,与村民关系融洽,谁借谁,她就借给谁。不过,当很多人都学会了骑自行车后,来借自行车外出办事的人络绎不绝,甚至排成了队,有时能排到三四天后。芑兰有车不能骑,到公社、县里和外开会还得用步量。可她心里很快乐。她说,能为村民们解决燃眉之急,怎能不快乐哩!

自行车,记载了太多太多的故事,见证了老百姓生活的变化。黄村人家,虽然早已普及了摩托车、电动车,还有不少人家买了小轿车,但在芑兰的号召和劝说下,很多老年人搬出了旧自行车,或买来新自行车,走了一村又一村,游了一镇又一镇,看了一城又一城……他们骑着这绿色环保交通工具健身哩!②8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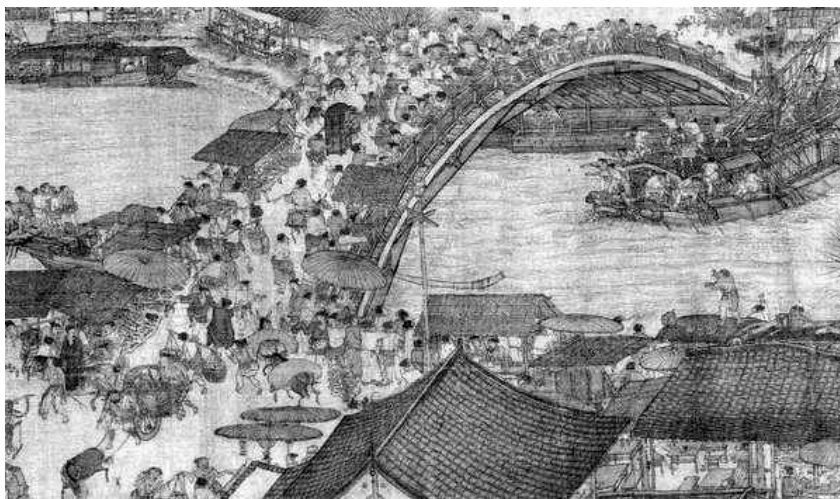
## 周口航运史话系列之五

# 北宋:“蔡河贯京师,为都人所仰”

常全欣



宋代惠民河示意图



清明上河图反映的宋代航运盛景

北宋定都开封,在五代后周的基础上,不断建设以开封为中心的航运网,汴河、惠民河(即蔡河)、广济河、金水河“四水贯都”。我们主要说说惠民河。

惠民河是豫东平原上一条规模不太大的古运河,在此之前是鸿沟沟、沙

水、蔡河。从先秦到隋唐,时通时塞。后周定都开封,显德元年(954年)四月,宰臣李谷疏导蔡河;显德六年(959年),“自大梁城东导汴水入蔡水,以通陈颍之漕”,后经过北宋时期的继续疏治,为四大漕河之一,“蔡河贯京师,为都人所

仰”,成为中原航运网中连接沙颍河、淮河等水道的主干。

惠民河包括颍河、蔡河和自合流镇(今西华逍遥)至长平镇(今西华)一段河道。乾德二年(964年),颍河和蔡河成为以开封为中心的北宋航运网中的两大支脉。开宝六年(973年)三月,“始改颍河为惠民河”,此后,蔡河也称惠民河。其故道就是循古沙(蔡)水自开封东导汴水,南经通许、尉氏、扶沟至淮南北,分为沙、蔡二水入颍。

但是,惠民河湾多、河面窄、水源少,受天然降雨的影响明显,时而水浅阻航,时而泛滥成灾。北宋王朝非常重视对惠民河的疏治,另辟水源解决漕用水,在前后六十余年间,终于建成了一条漕路。

宋初“首浚三河”,着手解决蔡河用水问题。据《宋史·河渠志》和《玉海》记载,建隆元年(960年)四月,“命中使浚蔡河,设斗门以节水,自京距通许镇”。第二年,又发“畿甸、陈、许丁夫数万人浚蔡水,南入颍川”。同时,“导颍水自新郑与蔡水合”,为蔡水开辟了新的充沛水源,基本上适应漕用水。

兴建“大流堰工程”,畅通漕道。宋太宗太平天国元年(976年),西京作坊副使、尚食使符昭愿,率兵卒丁夫西起颍水自合流镇东,开河抵长平镇,把颍水与蔡水沟通。真宗、仁宗时期,对这一工程进行了重修。《宋史·河渠志》记载,大中祥符九年(1016年),“于大流堰穿渠,置二斗门,引沙河以漕京师”,即是引合流镇南的沙河水入颍河,再沿已开的合流镇至长平镇的渠道入蔡河。天圣二年(1024年)二月,“重修许州合流镇大河堰斗门,创开漕水河通漕”,继续利用颍河通蔡河,对原有渠道工程进行重修。工程完工后,颍水与蔡水于中游相通,使沙颍河漕船径直入蔡,省去绕行今商水县至今淮阳县豆门至项城水寨间蔡口一段迂路。这是沙颍河流域自战

国鸿沟开凿以来最宏伟的一次人工改造工程。沙颍水入蔡,时间跨度较长,苏轼于1071年七月离京拜蔡赴陈,途中作诗“颍水非汴水,亦作蒲萄绿”,可见当时蔡水和颍水相通。

为更大程度地满足漕运水位需要,在惠民河上开始设置斗门,调节水量和控制舟楫往来。《宋史·河渠志》:“犹以其浅涸,故植木横栈,栈为水之节,启闭以时”,用简易的蓄水木结构的节制闸控制河水,算得上当时解决河枯水浅航行困难的良策,被普遍使用。陈州置有惠济闸。《汴京遗迹》(卷七)说:“……惠济闸在陈州门外,……俱为蔡河而设”。苏轼诗句“船留村市间,闻发寒波涨”,就写到了当时的简易船闸。

有了畅通的航道、充沛的水源,大量粮食和钱帛盐茶、薪炭等物资由惠民河直运京师开封,惠民河漕运迎来发展的春天。《宋史·史货志》载,开宝五年(972年),“率汴、蔡两河公私船运江、淮米数十万石,以给兵食”。太平天国六年(981年),惠民河漕运数额增为“粟四五十万石,菽二十万石”。景德四年(1007年),漕运“上供年额”定“惠民河六十万石”。治平二年(1065年),惠民河“漕运至京师”的数额为“二十六万七千石”。这条漕道为输纳京西乃至淮南二路粮财,巩固中央集权,活跃京畿贸易,促进经济发展,发挥了巨大的作用。

惠民河漕运繁荣的背后,陈州一带却为之承受着洪水频发的灾难。由于扩大了惠民河的水源,众多的河流汇入了颍河,每当夏秋之间汛期到来时,颍河水位暴涨,使地势低洼的陈州一带溢流成灾。

北宋末年,中原航运网逐渐衰落。钦宗靖康元年(1125年),金兵入侵,中原漕运不通。北宋亡于金后,南宋偏安一隅,中原一带战事不断,惠民河等中原漕运通道昔日水运盛况不再,大部分河道淤塞,直至无迹可寻。②8

